

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

——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陳方正

整三十年前，我們在創辦本刊的時候這樣說：「在本世紀，中國人心裏曾多次燃起希望的火炬，可是，暴風雨中它並不能持久，一次又一次晃動，閃爍，終告熄滅。……中國，有這樣悠久文化傳統，這樣優秀人才和龐大潛力的中國，又再一趟遭到挫折，陷入危機之中了。」當時我們認為：「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波折重重，……總的來說，建立新文化的決心和努力不足，恐怕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因此將「建設一種多元的，有前瞻性的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定為本刊的信念和努力方向^①。三十年如流水般過去，其間中國再次經歷了難以想像的巨大變化。出乎意料的是，這雖然帶來了前所難以想像的進步，卻也再一次產生重大危機，再一次把中國帶到歷史轉折點上。因此，在此時刻重新審視我們當日的信念，並且對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化建設作更深入討論，應當是再也適當不過了。

一 中國的巨大變化

那麼，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究竟發生了些甚麼樣的變化呢？簡單地說，它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蹟：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31.3倍，躍居世界第二，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則居世界之首^②。當然，那是由於人口龐大：中國的人均GDP現在剛超越1萬美元，發展水平仍然略低於中等國家^③。但這個變化仍然是極其驚人的：在同期，中國的城鎮化率激增至61%^④；中產階級達到全國人口的39%，即5.45億，超越了美、日、德三國人口之總和^⑤；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市場和最大旅遊出口國^⑥；工業生產值和貿易出口值都穩佔世界首位^⑦。支撐如此強大生產力量的是基礎建設：中國電力年產量現佔全球總值26.7%，約略相當於其次三國之總和^⑧；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分別建成總長15萬公里和3萬公里的全球最大網絡，後者更佔全球總里數三分之二^⑨。與此同時，中國人的體魄也強壯起來，不僅在奧林匹克賽場上表

現優異，預期壽命也從69歲提升至76.7歲，超越世界和許多地區的平均值^⑩。在高科技方面，中國雖然還落後於歐美和日本，但在移動通訊、超級電腦、太空技術、衛星定位等領域卻也達到前緣水平甚至領先位置了。

統而言之，和大多數人當年的預期完全相反，在這三十年間中國取得了非常迅速和全面的進步。但這個巨大變化到底是如何得來，它的意義何在，為何反而導致了新的危機，而知識份子今後又應當如何為自己定位？這是我們要在下面討論的一連串問題。

二 中國為何能夠走向富強？

中國如此龐然大國，在列強衝擊下受貧弱困繞將近兩個世紀，現在短短數十年間陡然脫胎換骨，走向富強，那絕對不是簡單的事情。它何以能夠致此，是必須認真探討的。我們將發現，這其實有許多不同層次原因。其中最切近的，當然莫過於1978年底定下的改革開放政策，亦即放棄自力更生，打開門戶，轉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學習，從而改革體制，「與現代世界接軌」，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是體現這個政策最關鍵、最具象徵性的一步。然而，奉行類似政策甚而受西方積極提攜的國家很多，為甚麼中國能夠像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一樣大獲成功，而中東、南亞、東南亞、拉丁美洲等許多其他國家卻徘徊歧路，越趨不前呢？有人將此歸因於中國傳統文化，亦即中國人之自律、刻苦耐勞、注重教育、力求上進，以及它穩定而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那當然不錯，所謂「東亞文化圈」優勢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概都就是指此。

但這樣從外面看並不足夠，因為我們不能夠忽略俄國這個顯著的反例。它雖然歷史不及中國悠久深厚，卻累積了將近兩百年虛心向西歐學習，而且大獲成功的經驗。更何況，在蘇聯瓦解之後，它全面和徹底地轉向西方，完全接受民主選舉和保障私有產權這兩個制度，並且起用大批西方學者，以引進資本主義體制為國策。然而，這個破釜沉舟的「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不但沒有帶來進步和富強，更導致了經濟倒退、人口銳減的大災難^⑪。反而，中國「摸着石頭過河」的辦法雖然卑之無甚高論，卻顯示出極大的智慧。說到底，巨大如中俄兩國，其體制改革必然是高度複雜、史無前例的創舉，因此必須謹慎緩慢地視乎實際情況來逐步嘗試、探索，並且在每個重要關頭作出獨立判斷。西方先進經驗固須借鑒，卻不能夠簡單移植，而需要緩慢吸收，也就是主動消化、選擇、修訂以適應實際情況。這是個艱辛、緩慢、痛苦、絕不能夠省略的過程，中國成功的關鍵即在於此^⑫，俄國自彼得(Peter I)和葉卡捷琳娜(Catherine II)兩大帝以至葉利欽(Boris N. Yeltsin)總統的失敗，其根本原因恐怕同樣在此。

龐大如中國的那樣一個政治體系，如何能夠實現如此複雜的外來知識、體制之引進、衡量和本地化呢？很顯然，強大和具有堅定目標的中央政府是

先決條件，但那並不足夠，它還需依賴廣大的知識份子階層^③。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在改革開放事業中一直非常活躍：他們不但在各自專業領域努力吸收國外資訊和推動創新，更在許多不同層次協助政府形成明智決策。換而言之，政府與知識份子之間的全面合作與互動，是改革至終能夠成功的關鍵。當然，在中國這並不是甚麼新生事物。如所周知，近兩百年來中國的自強、維新、改革、革命、新文化等連串重大運動，就都是由當時的知識份子即士大夫推動，而毫無疑問，他們則是承接了宋代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這個傳統的淵源更可以一直追溯到漢代。因此，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不僅僅在其對個人素質的薰陶，而還在於它所塑造的、深入人心的大一統政治格局與理念，即國家以知識份子為基礎，知識份子承擔國家命運，那是超越地域與民俗，而承載於中國文化整體之上的。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體制前後凡三變，這個傳統理念雖然飽受衝擊而曾經一度崩潰，卻仍然蟄伏在文化意識底層，一旦如同1978年那樣暴露於新的政治氣候，就迅速復蘇和發揮無比巨大的作用。



反過來看俄國，在歷史上它相當於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是東正教教士。他們與廣大民眾關係密切，並曾經在極其艱困的環境中領導多次抵禦外侮的運動，因此無異於國家靈魂之所寄。然而，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東正教會便成為教宗與沙皇反覆鬥爭的犧牲品，至終被壓制而完全失去活力。此後出現的新型知識份子雖然在專業上十分出色，文化上卻缺乏傳統的滋潤而顯得飄盪無根，由是政治上便只能夠依託於外來意識形態，而不斷地走向激進。他們與中國知識份子的根本區別，即在於喪失了植根於本土文化的國家建構意識與承擔^④。因此，知識份子的文化意識與對國家命運之承擔，是中國能夠復興的一個最根本原因。

三 鉅變為中國帶來了甚麼？

近三十年的鉅變令人振奮，但它到底為中國帶來了些甚麼，那還需要仔細分析。就國內而言，最直接和明顯的，自然是相當部分國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得以享受現代科技成果，而廣大民眾也有望在不久的將來「脫貧」，這是個舉世公認的了不起成就，絕不容輕視。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場變革，中國終於從將近兩百年的挫敗與屈辱中站起來，重新獲得尊嚴和自信，並且由此而摸索出一個持續發展、蛻變的模式，因此在可見的未來，譬如說今後三十年間，達到先進發展水平已經不再是空想^⑤。然而，我們也必須認清：生產力和經濟成就是發展的基礎，卻並不是一切。中國目前的大發展是

以放棄政治改革，壓制言論自由以維持穩定局面換回來的，其代價是知識份子喪失了相當大部分功能，以及社會下層承受大量不公正待遇，由是使得怨憤不斷累積。當然，有不少人認為，為了快速發展，這些問題無可避免，它們將來會隨着社會變得富裕而自然消解。但真就是如此嗎？還是今後的進一步發展將會受到這些問題的困擾和制約呢？那樣的可能性是不容抹殺的。

就國際而言，經濟大崛起無疑令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為它贏得了國際上的重視和尊敬——當然，疑慮、恐懼乃至敵意也就隨之而來，當今中美之間的全面激烈對抗方興未艾，實際上已經成為無硝煙戰爭了！美國的霸權行徑有許多先例，它在1980年代強加於其他先進工業國家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以及最近不擇手段阻止「北流二號」(Nord Stream 2)油氣管道的興建就是兩個最顯著的例子^⑥。它對於盟友尚且如此橫蠻箝制，對於體制、文化、理念截然不同，而經濟總量則寢寢然即將超越自己的中國，自然絕對不可能坐視不理，而必然要如目前般不惜一切來全面壓制。那是中國蓬勃發展的必然後果，而絕非美國何黨派主政，或者中國在貿易上作何讓步，甚至在體制上作何調整，所能夠改變的。

所謂「匹夫何罪，懷璧其罪」。我們必須認清一個關鍵事實：中國在經濟、科技、軍事等各方面發展到國際先進水平的潛能現在已經充分顯露出來，而中國人口(14.0億)遠遠超過整個第一世界，包括英、美、加、澳、紐、歐盟以及日、韓、俄之總和(12.4億)。因此，倘若中國以目前的態勢繼續發展下去，至終必將左右甚至支配整個世界，其壓倒性力量將遠遠超過今日之美國。對於這個前景，其他發達國家可能只是感到害怕和無奈，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即成為世界霸主的美國則絕不可能接受，而必然要如它目前所做的那樣，聯合一切力量，窮盡一切方法來阻撓、對抗、打壓。這不折不扣就是它的「存在之戰」。

國際政治是現實的，美國當初之所以接受中國加入WTO，也就是讓它融入其所主導的世界，其實完全是基於戰略考慮：一則是在越南戰爭大敗之後需要聯合另外一個大國來對抗蘇聯，再則是看中了中國的龐大市場，最後則希望藉此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即使這個企圖失敗也無妨，因為美國認為，中國倘若堅持社會主義體制，則不可能提高經濟效率，也就不足為患^⑦。它的第一個盤算不錯，因為大約十年之後就贏得了冷戰勝利，但其餘的想法則顯然大錯了，而那正就是美國發動貿易戰爭，甚至不惜損害本身利益，以堅壁清野戰略來與中國全面「脫鉤」的原因。在它的巨大壓力下，整個西方世界與中國的關係已經無可避免地轉趨複雜多變，今後恐怕還將不斷受到困擾而逐漸冷淡下來。在這嚴峻形勢之下，中國一再宣示擴大與各國交流合作的決心，並且以多種實際行動來吸引外資，包括開放利潤豐厚的金融業和保險業，但是否能夠就此扭轉局面，長遠發展如何，都尚在未知之數^⑧。統而言之，中國的大發展打破了現有國際格局；舊局既破，新局未成，其間的碰撞推移就是當今大混亂、大危機的根源。

四 改革開放所產生的基本矛盾

如上面所說，改革開放驚人的成功已經在國外引起巨大反應和阻力；不但如此，而且它是個雙向過程，所以本身和中國現行體制也有潛存矛盾，倘若照目前的方式繼續發展下去，也難免對後者造成衝擊，並且因此而受到制約。

讓我們從最淺近的問題開始談起吧。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環節是鼓勵國人出洋留學，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學生輸出國，2017至2018年間，每年達六七十萬人。然而，學成歸國的學者人數，卻只及同年出國人數的七八成，至於學術領軍人物選擇歸國定居的，更屬鳳毛麟角。換而言之，鼓勵出國留學造成了嚴重和長期的「腦流失」(brain drain)問題——事實上，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歐洲各國也都深受其困擾。國際上的劇烈人才爭奪是世界性現象，而左右人才去留的因素很多，家國情懷和薪酬水平僅僅是其中一部分，除此之外，文化氛圍、社會活力、言論空間等雖然是間接和無形的，其實也同樣重要。畢竟，對大多數才華洋溢、富有創造力的人來說，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寬鬆自由、不會處處受到掣肘的工作環境，以容許他們的新觀念得以盡量發揮。因此，講究紀律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容或有利於保持穩定，但對吸引高端人才卻極其不利。從長期發展的角度看來，這矛盾是必須解決的。

其次，改革開放帶來了社會發展，但那卻會反過來衝擊集權體制本身。現在中國和世界各地之間的人員流動量極其驚人：2018年出國旅遊者達每年1.5億人次，來華旅遊的外賓，來往求學、經商、工作者也以數千萬計。這巨大人流加上鋪天蓋地、無孔不入的電子媒體，必然會在中國與世界各地之間造成習俗、品味、思想上的相互瀰散、滲透，從而影響國人的深層次觀念和傾向，包括對個人自由、倫理關係、社會習俗、政治追求的理念和判斷。迄今為止，這些影響好像還不太顯著，還完全能夠為現行體制所控制。但隨着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基本觀念的變化必然會繼續累積，中央也因此將會需要不斷加強控制力度以維持穩定，由是體制本身與社會之間的日益疏離和對立也就難以避免。

從以上兩個問題看來，倘若要繼續擴展和深化改革開放，那麼中國至終恐怕不能夠避免考慮其高度中央集權體制本身之改革。這是個極為敏感和複雜的問題，沒有人能夠清楚知道應當如何進行而不重蹈蘇聯的覆轍。更何況，政治改革不僅終極目標重要，變革過程本身也同樣重要，它們都同樣是問題的一部分。很顯然，我們無法在此討論如此重大問題，但有兩個基本原則是沒有疑問的，那就是中國需要借鑒西方發展政治體制的豐富經驗和理論，但絕不應該，也不可能簡單地移植或者抄襲西方體制，而必須尋求自己的獨特解決方案。這顯然要比經濟體制改革更為複雜和困難，需時也將更長，但為了民族復興，也是遲早都必須跨出的關鍵一步。

五 改革開放的終極意義

從更寬廣的角度看，上面的討論不免令人想起另一個問題：中國擁有極其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超過整個西方世界的人口，現在經濟也蓬勃發展起來了，國際貿易上更是大量「出超」，卻為何在文化、藝術、思想的交流上總是嚴重「入超」，總是害怕受到外國理念的顛覆而喪失主體性，因而要花大量資源和精力處處加以防範呢？這並非通過政策或者體制調整可以解決的小事，而是根本性問題，因為隨着改革開放的擴張和深化，它只會愈來愈嚴重。所以我們必須認真追問，造成文化理念「入超」或者所謂「軟實力」不如西方的根本原因到底何在。

這可以從兩方面看。比較切近現實的是，出於維護穩定和掌握民心的考慮，中央政府往往致力於宣揚狹義的傳統文化和愛國理念，並且以這個固定的標準來衡量和管制書籍、報章、雜誌、戲劇、電影、教育、電子媒體等各種文化載體，以致在今日經濟如此蓬勃的局面下，文化的發展反而顯得異常單調和停滯，不能夠對世界各地發揮與國力相應的衝擊力。這是十分可惜而又可悲的事情，其關鍵就在於文化的判斷和發展不可能由小部分行政官員承擔，而應該歸還給文化人，也就是廣大知識份子，那樣它才可能獲得旺盛的生命力，才有可能影響世界。當然，這也就意味，言論自由的尺度必須放寬，否則一個繁榮蓬勃的文化環境是不可能出現的。

但退一步從歷史上看，則必須老實承認，所謂「現代世界」根本就是由歐洲文明造成，因此它的科學、哲學、文學、藝術、音樂、倫理觀念、政治觀念等等，以至各種學術發展方向，也莫不是首先出現和蓬勃發展於西方，然後擴散到全球的。因此，我們別無選擇，必須繼續努力吸收和消化他們所創造的這個現代文明。其實，以中國的龐大人口和經濟基礎，以及中國人的勤奮才智，這肯定是可以做到而絕不需要擔心喪失民族歸屬感或者認同感的——以日本不及中國十分之一的人口，經過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的「脫亞入歐」運動，他們的傳統尚且沒有喪失之虞，甚且因此更為煥發，為何中國反而需要擔心呢？所以，問題的癥結其實在於過份強調統一思想的必要。國家施政或者發展策略固然需要有一定方向和目標，但就更廣泛的、滲透於整個社會的文化而言，則必須依賴廣大知識份子的共同努力和判斷，他們在過去近兩個世紀對於中國現代化的巨大貢獻就是這一點的最好說明。

說到底，長期奉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意義是：中國承認自己總有不足，因此需要向全世界學習，不但今日如此，日後也應當如此，所以這是長期的吸收、改進，而非短期的「惡補」。孔夫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把這個大道理講得再淺白、再透徹沒有了。在過去四十年間，中國把這個基本國策用於科技與經濟而獲得極大成功，在將來，則應該把它推廣到學術、文化、藝術、音樂、習俗乃至政治體制等所有其他層面，這才能夠獲得真正的突破和民族復興。雖然中國目前的體制帶來了三十年空前蓬勃的經濟發展，但還不能夠就此認為已經完善，否則就不會

有那麼大量的成功企業家和專業人士以種種不同方式，或明或暗地移民海外了。因此，必須承認，中國其實還有許多可以借鑒於西方國家，可以通過仿效、吸收它們的經驗而改進的地方，而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帶來的寬鬆自由環境就是其中之大者。我們不可忘記，在歷史上中國文化本來就是不斷地吸收域外事物、哲理、觀念、風尚、人才，這才得以壯大、豐富，才得以造成漢唐盛世的。「有容乃大」是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老話，它本來僅指個人修養，但推廣到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整體，意義當更為重大。

六 當今知識份子的使命

那麼，在今後更寬廣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知識份子究竟還有些甚麼與前不同的責任、功能是應該擔負起來的呢？倘若我們將近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和十七八世紀的歐洲啟蒙思想家比較，則他們的功能，特別是在引進、闡揚新學說和對傳統發起激烈批判這兩點上，的確頗為相似^⑩——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就將胡適比為「現代伏爾泰」^⑪。然而，近代中國雖然不乏扭轉時代風氣的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胡適、陳獨秀之輩，也盡有在考古、古史、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領域中具開創能力的第一流學者，卻獨有一塊空白至今無人嘗試也因此未能彌補，那就是政治理論的創新。我們至今還沒有自己的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霍布斯(Thomas Hobbes)、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更不要說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邊沁(Jeremy Bentham)、穆勒(John S. Mill)、馬克思、羅爾斯(John Rawls)。這些名字令我們肅然起敬也望而生畏，他們都成了遙不可及的泰山北斗。

我們有大量學者去鑽研最高深的數理科學、最複雜的分子生物學，他們都不缺乏創新雄心和獲取最高榮譽的能力，像楊振寧、李政道、華羅庚、陳省身、丘成桐等幾位數理科學家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榜樣。但現代政治理論在中國卻有如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是個荒涼的無人區。這是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因為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核心就是政治理論。但自從大一統帝國出現以來，我們所有的政治論述就都被古代聖賢和諸子百家所籠罩，再也無法從中跳出來，再也沒有開創嶄新體系、自成一家的雄心和氣魄了^⑫。其後果是，就近現代政治觀念而言，我們只有輸入、吸收、闡釋、推廣，而從來不曾想到可以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可以創新，可以自成體系。然而，現成外來理論決不可能完全適合中國這個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國。況且，國家體制比經濟體制更根本、牽涉更廣，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要「摸着石頭過河」也不容易，這就是當前中國在政治發展上所遭遇的基本困難。

這困難並非出於偶然，而是由東西方截然不同的學術傳統造成。事實上，霍布斯、孟德斯鳩、盧梭並非憑空出現，他們背後還有一個極其豐富、悠久的政治理論傳統，那從十二世紀索爾茲伯利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撰

《政治家》(*Policraticus*) 開始，以至十四世紀但丁(Dante Alighieri) 撰《王政論》(*De Monarchia*) 和馬西利烏斯(Marsilius of Padua) 撰《和平保衛者》(*Defensor pacis*)、十五世紀沙魯達提(Coluccio Salutati) 撰《專制論》(*De Tyranno*)、十六世紀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撰《君主論》(*Il Principe*) 和博丹(Jean Bodin) 在《共和六書》(*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提出絕對主權觀念等等，真可謂洋洋大觀。而在他們之前，則還有五世紀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的《上主之都》(*The City of God*)，和十一至十二世紀之間那場著名的「授職權之爭」(*Investiture Contest*)，它在教皇和神聖羅馬皇帝之間引起了歷時近一個世紀，以法理學為利器的全歐洲政治和宗教大論爭、大風暴。這個傳統反映了一個歷史事實，即在西方，政治分裂和競爭是常態，如羅馬帝國那樣的一統反而是變異，而正就是分裂和競爭，使得西方有關不同政體的優劣比較和正當性爭論此起彼落，從不止息，由是促進政治理論的蓬勃發展。反過來看中國，則自秦漢以來，大一統皇朝已經成為常態，政治討論遂局限於具體政策問題，或者亂世中的縱橫捭闔之術，再也不涉及宏觀和基本政治原理。因此當二十世紀之初西方政治學說大量輸入之際，我們的學者就只能夠奉之為圭臬，致力於吸收、消化和弘揚，再也沒有想到創新的可能和需要了。

這樣一個由歷史造成的困局，如何才能夠打破？很明顯，它是個長遠文化問題，只能夠通過知識份子的努力來謀求解決，而解決的第一步，則是重新認識知識份子所應有的功能。對傳統士大夫來說，這有兩個不同方面，即從政和議政。在今日，知識份子的身份改變了，「從政」擴大為以專業知識貢獻國家，「議政」則擴大為抨擊社會和政治上的弊端和一切不公平現象。這兩方面都非常重要，而後者尤其為社會所看重，因為它不但填補了社會需求的空白，而且需要擔冒風險。因此所謂「公共知識份子」更往往以此為本身的唯一使命。

但一個文明的進步不能夠單憑批判，而還需要創新。在今日，人人都知道創新的重要性，都呼籲、提倡創新，但那都是指經濟和科技創新，至於社會科學理論的創新則無人問津。這自不足為奇，因為市民大眾的關注自然在有切身影響的事物^②。不過，如上文所反覆論證，中國目前最需要認真考慮的，反而是政治格局的長遠改進，而這有賴於中國人自己的新思維、新構想。因此，當今中國知識份子除了前述兩重功能以外，還有急需發展的第三重功能，即宏觀的、有關人類文明與政治理論體系的思想創新。沒有這樣的創新作為引導，中國的經濟發展無論如何強勁有力，也都將難以轉化成為主導世界的政治力量。當然，要從無到有，在西方傳統以外另起爐灶，發展中國自己的政治理論體系，實際上等同於為中華文明開闢一個新領域，那是既艱鉅又長遠的工作，也是對中國知識份子整體的絕大挑戰。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當今中國知識份子所處雖然是相當低迷的文化氛圍和十分狹窄的言論空間，但這仍然是他們必須面對的課題，必須開始填補的空白，那是沒有疑問的。

七 倏忽卅年如電抹

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今日中國已經可算進入小康，而在下一個三十年站到世界最前列，實現民族復興的宏願，似乎也不再止於夢想，而是依循目前的道路穩步前進就可以抵達的了。相信所有中國人都希望，未來的確就會如此。但假如真是這樣，那麼還有一個大問題是不能夠忽略的：在未來，當中國經濟力量可以與整個第一世界匹敵，也就是能夠左右全世界發展趨勢的時候，我們到底將用何種理念、何種願景來領導世界？屆時那將不再是一種選擇，而將變為一個無可推卸的責任了。而且，這種理念和願景恐怕也正就是決定一個民族是否的確能夠站到世界最前列的決定性因素。

讓我們回顧一下十六世紀初的西方吧。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鼎盛時期，它們憑藉一個多世紀的遠洋探索、大無畏的勇武精神和堅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在新大陸和遠東開闢了自己的新天地，不但攫取無量黃金、白銀和珍貴香料，而且在海外建立起龐大富庶的殖民帝國。在當時，如夢初醒的英法兩國方才剛剛開始探索北美洲的荒涼沿岸，那裏並沒有金山銀山，也沒有大量可供奴役的土著，而只有大片荒野可供辛勤開墾，以及饒勇善戰的印第安人節節抵抗他們的入侵。然而，五百年過去，將今日的美國、加拿大與拉丁美洲諸國相比，其貧富強弱之分何啻天壤。它們長期發展結果的巨大差別，並不取決於當初的起點如何，而取決於開拓者的志行、理念、願景之高低，那是再也清楚不過了。

因此，在今日，中國各方面的進步固然可喜，但在世界上地位提高、力量增強之後，其所急切需要的，絕不是宣揚愛國主義或者中華文明的偉大，而是戒慎恐懼，清楚認識到這個進步只是在經濟建設而已，至於在科技、學術、建築、藝術、音樂、文化等其他方面，落後於先進國家、需要虛心學習和努力追趕之處，其實還多得很。如我們一再指出，現代世界基本上是由西方觀念塑造而成，這從十四世紀初的文藝復興開始，至今已經七百年。在此期間，在它這個文明體系裏面的十數個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在許多不同方向嘔心瀝血相互競爭、激烈比拼，其所釋放的能量以及獲得的成就極其驚人，可謂人類歷史上並無前例的。所以，在與伊斯蘭文明長達千年的碰撞與爭戰之中，它們至終獲得決定性勝利絕非倖致。除非中國的知識份子能夠將這些過往教訓時刻銘記於心，繼續像一個世紀之前的先輩那樣夙興夜寐，奮發有為，那麼當未來三十年猶如閃電般一抹過去之後，中國到底能夠站在世界上何等位置，恐怕還是難以確定的。

八 遙望未來新天地

在過去五百年間，歐洲人以大無畏精神探索海外，從而發現、征服和佔領新世界，然後更進一步創造出一個無論理念、經濟或政治都由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今日如夢初醒的中國人雖然立定腳跟，重拾信心，但心底裏卻總

不免憤憤不平，總有先機已失，時不我與之歎。其實，這是非常短視而完全沒有必要的。我們自詡具有五千年連續不斷的文化，那就更應當把眼光放長遠，而不局限於當今大國之間的角逐和競爭，因為影響人類前途深遠得多的，可能是今日大家只隱約意識到，但尚未認真思考過、正視過的，由生物技術以及人工智能飛躍發展所帶來的顛覆性變化。當2050年來臨的時候，中美問題很可能已經成為明日黃花，甚至消失於無形，而最令人感到焦慮乃至恐慌的，倒很可能是完全由人工設計的新生命已經在繁殖，人工智能已經接近乃至超越人類²⁹。屆時由人擔當的大部分工作可能都已經交給了機械人，人的存活價值和生命意義因此都成為迫切問題了。倘若這有如癡人說夢，那我們不妨回顧，四百年前開普勒(Johannes Kepler)在《夢：月球天文學》(*Somnium seu De Astronomia Lunari*, 1621)這部小說中已經想像人類登月和月球上所見天體景象³⁰；而差不多同時，一位德國修道院院長在其身後出版的《密碼術》(*Steganographia*, 1606)一書中，已經預見今日的互聯網與智能電話技術³¹。因此，在不捨晝夜地滾滾前進的科技洪流之中，今日的異想天開變為明日之現實是完全有可能的。

科技進步衝擊和重構社會，改變地球環境，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這是大家都熟知、都承認的事實。然而社會一旦發生基本改變，它無可避免也要反過來衝擊人的本身，包括人對自身的觀念。在今日，醫學的飛躍進步使得人的軀體日益淪為名符其實的「臭皮囊」，其中各部分都可以修補乃至替換；胚胎學、遺傳學的進步使得傳宗接代喪失了本質性和神聖性，而變為可以通過生物技術來干預、補救，甚至選擇性地優化、改進的過程；腦神經科學和微電子技術則已經入侵人的大腦，試圖使它直接和電腦溝通。對人體每一部分，每一功能、作用的科學研究不會，也不可能停止下來。那麼，當人被研究、分析透徹之後，他還能夠是那個變化莫測、具有無上尊嚴的萬物之靈嗎？他的行動、功能、思維難道不會被大量生產的仿製品，甚至更靈巧、更高級的嶄新產品，所替代乃至超越嗎？如所周知，在較低層次，人類功能之被替代已經如野火般在蔓延，而在不少特定領域，人類智力之被超越也已經成為現實。唯一剩下的問題只在於野火何時會燎原，所謂「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何時會出現而已。

對許多人來說，這前景也許並不可怕甚至很美妙。畢竟，高科技是為人服務的，在一個主要由智能機械人運轉的世界中，人不正好各自享受豐盛人生，也就是極視聽之娛、口腹之樂，或者遨遊四海，或者從事自己喜愛的創作或者研究嗎？誠然，但這有兩個大問題。首先，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結構基本上是由它各部分對於生產的相對貢獻來決定的，倘若生產不再需要大部分人的投入，而可以委諸由極少數人控制的大量機械人，那麼社會到底應當根據何種原則來建構，一般人又還有甚麼生存價值？目前高科技在社會上所帶來的財富分配之極度不均正就是這個問題之反映³²。其次，在更根本層次，倘若人人都可以不勞而獲，生活只在於享受官能刺激和馳騁智力，這樣的生命還有意義嗎，人還能夠自覺有生存於天壤之間的價值嗎？自從大約

五十億年前地球形成，生物出現以來，不同物種(species)就一直在互相競爭，不斷進化，人之出現好像意味這過程已經來到了終點。然而，進化果真會就此停頓下來嗎，還是會一如既往地繼續，以迄比人類更高級、更神靈的物種出現呢？這無人能夠知曉或者預言，但從科技不斷加速發展的趨勢看來，這樣一個突變在不太遙遠的未來出現，也是不可能完全排除的。

面臨如此不可知、不可測，也難以想像的前景，中國知識份子能夠為人類社會的未來提出甚麼理念、甚麼構想呢？能夠為未來人類生命的意義提出甚麼新看法呢？三百年來的科技大發展已經為人類開闢了一個前所不能夠夢見的新天地，那比之當年哥倫布所發現的新世界已經寬廣新奇得多。如何領導二十一世紀新人類理解、建構、經營、適應這個新天地，以及迎接也許將在一兩個世紀之後到來的，更不可思議的另一個新天地，正就是今日中國知識份子的特有權利；當然，同時也就是他們不可推諉的責任。

註釋

① 陳方正：〈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0年10月號，頁4、5。

②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在1997年的修訂估計，中國在1989年的GDP為0.456萬億美元；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估計，中國在2019年的GDP為14.3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21.4萬億美元。倘若以PPP估算，中國和美國在2019年的GDP分別為23.5萬億和21.4萬億國際元。參見「維基百科」(Wikipedia)及世界銀行在網上提供的資料。

③ 根據世界銀行估計，在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以匯率計是10,262美元，低於世界平均值(11,429美元，美國為65,118美元)約10%；倘若以PPP計算，則是16,785國際元，那仍低於世界平均值(17,673國際元)的5%。

④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其時城鎮化率為26.2%。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公布，中國在2019年底的城鎮人口達到60.6%。參見《經濟日報》，2020年2月28日。

⑤ 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用「中產階級」定義為每日收入10至50美元，相當於年收入3,650至18,250美元。參見China Power Team, "How Well-off Is China's Middle Class?", <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a-middle-class/>。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19年中、美、日、德四國人口分別為13.97億、3.28億、1.26億以及0.831億。

⑥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屬下機構國際能源總署(IEA)的報告，中、美、歐盟及全球的2019年汽車銷售額分別為2,500萬、1,700萬、1,700萬、8,800萬輛，即中國佔28%。參見IEA, *Global Car Sales by Key Markets 2005-2020* (17 May 2020), 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charts/global-car-sales-by-key-markets-2005-2020。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轉引世界旅遊組織(UNWTO)的報導，中國外出旅遊人次從2000年的0.1億增加15倍至2018年的1.5億，總消費額達到2,773億美元，超過排第二、三位的美德兩國之和。參見Oliver Smith, "The Unstoppable Rise of the Chinese Traveller—Where Are They Going and What Does It Mean for Overtourism?" (2 July 2019), *The Telegraph*, www.telegraph.co.uk/travel/comment/rise-of-the-chinese-tourist/。

⑦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引用的數據，中、美、日、德四國在2018年的工業生產值分別佔全球總值的28.4%、16.6%、7.2%、5.8%，亦即中國超過美日兩國之和。參見Felix Richter, "These Are the Top 10 Manufactur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25 February 2020), World Economic Forum, www.weforum.org/agenda/2020/

02/countries-manufacturing-trade-exports-economics。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數據，在2018年世界前四名貿易出口大國是中、美、德、日，其出口額分別為2.49萬億、1.66萬億、1.56萬億、0.74萬億美元，參見Jeff Desjardins, “Mapped: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s in 2018” (3 October 2019), www.visualcapitalist.com/mapped-worlds-largest-exporters-in-2018/。

⑧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局(EIA)數據庫，在1990年全球電力產量約11,304萬億瓦時(TWh)，中國僅590 TWh，佔5.6%。根據2019年6月的《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中、美、印、俄四國以及全世界在2018年的電力產量分別為7,112 TWh、4,460 TWh、1,561 TWh、1,111 TWh，以及26,614 TWh。

⑨ 有關高速公路，參見Wikipedia “List of Countries by Road Network Size”引自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Public Road Length - 2017”以及中國交通運輸部《2019年交通運輸行業發展統計公報》所作比較。有關高速鐵路，參見1961年創辦的英國行業刊物《國際鐵路雜誌》(*International Railway Journal*)的下列兩篇報導：Keith Barrow, “Ten Years, 27,000km: China Celebrates a Decade of High-Speed” (2 August 2018); Oscar Sinclair, “China Plans Largest-ever Railway Investment in 2019” (9 April 2019)。

⑩ 參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所發表之《人類發展報告2019》(*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中的2018年出生者之壽命預期值。根據該報告，全世界平均值為72.6；南亞為69.7；歐洲及中亞為74.2；東亞、東南亞、太平洋島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諸國為75.3至75.4之間。根據世界銀行資料，1989年中國人壽命預期值僅為69歲。

⑪ 俄國人口在1991年為1.4839億，其後持續下跌，以迄2011年的1.4296億，即減少543萬。至於經濟方面，根據世界銀行與OECD資料，俄羅斯在1991年的蘇聯GDP中所佔份額為0.518萬億美元，蘇聯解體後，它在1992年的估值跌至0.0918萬億美元，至1999年方才回升至0.210萬億美元，亦即從1991年起計，十年間跌去六成。參見Wikipedia所引俄國官方、世界銀行及OECD資料。

⑫ 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利茲(Joseph Stiglitz)即持此說。他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自1980年代開始多次為中國政府提供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意見，他於2018年9月14日在BI挪威商學院接受榮譽學位時所發表的演說(www.youtube.com/watch?v=law4n9IZDdc)討論了中國和俄國的改革，其核心思想便是中國成功的主要因素在於謹慎、漸進、獨立判斷和注重國內實際情況，而不是盲目移植外國體制。

⑬ 我們此處所謂「知識份子階層」兼指受過高等教育和專業訓練的「知識人」(intellectuals)以及具有社會批判和文化建構意識的所謂「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s，亦即intelligentsia)，而不作任何區分，因為他們其實都屬於同一譜系而沒有清楚分別的可能或者需要。

⑭ 這是高度簡單化的說法，其實俄國東正教教士與知識份子之間關係的發展十分複雜，詳見筆者的〈再回頭已百年身——《倒轉紅輪》讀後感〉，《中國文化》，2013年春季號，頁222-25，以及金雁：《倒轉「紅輪」——俄國知識份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的分析。除此之外，土耳其的現代化也有類似經歷：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實施激進世俗化國策的成功其實是在他之前「聯進會」發展本土文化意識的大量工作為基礎，而近年伊斯蘭意識在土耳其再次強勢崛起亦正好說明，即使在二十一世紀，文化傳統的生命力對於一個國家是如何重要。詳見筆者的〈從胡適和居卡爾普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載《現代世界的建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頁163-94；《大逆轉與新思潮——五四、啟蒙與現代化探索》(香港：中華書局，2018)。

⑮ 這個看法的根據大致如下：據世界銀行資料，以人均GDP計算，在1960年日本(479美元)只及美國(3,007美元)16%，它在二十七年後(1987)達到20,745美元而略為超過美國，此後十餘年間兩國始終在伯仲之間。在2019年中國與美國

的人均GDP(分別為10,262與65,118美元)之比為15.75%，頗接近1960年日美的比例，因此中國在三十年後趕上美國是有可能的。

⑮ 美國於1985年迫使英、德、法、日四國與它簽訂《廣場協議》，從而使得美元大幅度貶值，由是嚴重打擊日本的外貿，造成它經濟停滯的「迷失十年」(1991-2001)甚至二十年。至於「北流二號」油氣供應管道則是近年德國與俄國合作在波羅的海興建，由於它影響了美國能源輸出的大計，美國遂於2019年12月立法制裁與該油氣管道相關的眾多公司以破壞整個計劃，但由於德俄兩國政府的積極介入，並未能令行將完成的計劃停止，美國遂再於2020年7月擴大制裁範圍，至終結果如何目前尚未明朗。

⑯ 這是哥倫比亞大學現代史教授圖茲的觀點，參見他最近一篇評論四部中美關係著作的書評：Adam Tooze, “Whose Century?”,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42, no. 15 (2020), www.lrb.co.uk/the-paper/v42/n15/adam-tooze/whose-century。他特別指出，西方接納中國加入WTO的條件非常苛刻，中國能夠在外貿上打開局面是舉國總動員的結果，而事後美國左右兩派對此事的反省與爭論並不在於美方談判代表是否受騙或者能力不足，而在於他們到底代表了資本家抑或一般工人的利益。

⑰ 西方論者對中國前景的評估一般卻仍然頗為樂觀。圖茲上述文章預言，西方應當拋棄「其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的歷史性勝利」的念頭，接受和中國長期共存，因為「美國很可能隨着時間推移，變為(中國的)次級夥伴，最多也只是與中國龐大力量抗衡的小國聯盟之領袖而已。」參見Adam Tooze, “Whose Century?”。此外，為美國軍方服務的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最近提出長篇報告：Andrew Scobell et al., “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2020), 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798.html，它判斷到了2050年中國最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崛起大國」，即僅次於美國的龐大地區霸權，而不太可能成為「獨霸大國」(Triumphal Power)，亦不致陷入停滯或者崩潰。但這些都是僅僅就長期發展而言。

⑱ 當然，中國知識份子所闡揚的是從另一個文明(西方)引進的新觀念、新學問；啟蒙思想家所闡揚的，則以出現於鄰邦的新學說為主，雖然遠方文明(例如波斯或者遠東)的習俗、思想也在其討論之列。

⑲ 參見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46。

⑳ 直至十九世紀之前為止，中國士人中唯一真正能夠在政治觀念上「衝決網羅」的恐怕只能夠數李贄，即使明清之間飽嘗亡國之痛的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等大家，也都只是對王權體制作出評論，而未嘗試圖建立新的體系。

㉑ 其實切身事物亦往往與基本理論息息相關：近日美籍華人楊安澤(Andrew Yang)在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中提出了為所有國民制訂基本收入的構想，以應對人類工作日益為人工智能取代的問題，那便是科技顛覆傳統經濟理念，因此需要社會體系創新以求解決的一個絕佳例子。

㉒ 對此，不少人仍然視為天方夜譚，但這方面專家認真討論這種可能性的著作亦已不少，例如Nick Bostrom,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Ray Kurzweil,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 (New York: Penguin, 2005); Max Tegmark, *Life 3.0: 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ondon: Allen Lane, 2017)。

㉓ 此書有下列英譯本：*Kepler’s Dream: With the Full Text and Notes of Somnium, Sive Astronomia Lunaris, Joannis Kepleri*, trans. Patricia F. Kirkwo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㉔ Johannes Trithemius, *Steganographia* (Frankfurt, 1606)。

㉕ 前面提及楊安澤有關制訂國民基本收入的建議，其實便是針對此大問題而發。